

## 世纪老人黄绍湘

○毕克茜



一九三七年黄绍湘清华大学毕业照

黄绍湘，1915年5月10日生，中国美国史研究奠基人之一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。1937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，1946年6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。曾任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、人民出版社编审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。

老母亲黄绍湘百岁华诞，作为子女，心中感慨万千。百岁慈母，就像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；百年岁月，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长河。我只想从中捕捉些许点滴，以此敬献给这位世纪老人。

2001年，父母喜结连理62载。母亲在赠致父亲毕中杰的文章《心路历程》中

写道：“我自热火朝天的武汉来，君自山清水秀的无锡去，缘分撮合我们湘江来相聚，志同道合话投机。感君真诚，感情如清澈的流水、纯净的璞玉，我的坦率、朴实也打动你的心。在革命程途上，经过坎坎坷坷、风风雨雨，由革命情侣结合为伉俪，六十多年弹指一挥间，到如今，白头偕老，真不容易。”

这门婚姻遭到过母亲家人的强烈反对：父亲家境贫寒，当时只是一名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。而母亲出身名门，又是清华大学的才女。但是，他们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结合，同甘苦、共患难了70年。

母亲与父亲相识于抗日救亡的岁月里，战火纷飞，几经风险。他们辗转湘西，1939年5月抵达重庆，以教书为业，勉强糊口。困难并没有让他们放弃革命理想，在重庆的清华、树人等中学，父母率领学



1937年2月，北平学联地下党组织指派黄绍湘（第2排左1）担任“华北学生献旗团”团长，赴南京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，要求团结抗日，一致对外

生用油墨写传单、发传单，组织秘密读书会。在那批进步学生中，余春华、汪国桢、张其锬、秦川等后来都成为坚定的革命骨干。

生活虽艰辛，脚步却不停。姐姐慰萱和我在重庆出生了。

1943年，在中共南方局的同意下，母亲参加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行的自费赴美留学考试，并脱颖而出。南方局随即给予她部分津贴，经周恩来亲自批准，资助两千美金。母亲忍痛离夫别女，孤身一人留学美国，从此与美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44年8月，母亲由重庆登机，经驼峰航线先飞抵印度，后改乘海轮，历时一个半月的艰苦旅行，抵达美国旧金山，再改乘火车到了纽约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攻美国史。

从第二个学年起，母亲留学的全部费用均靠奖学金和打工所得勉强支撑。因为积极参加由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徐永焜



一九四四年黄绍湘在美国留学照

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活动，她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吓、跟踪，甚至殴打。战争岁月，自己丈夫和孩子的音信时断时续，母亲在日记中写道，“太思念孩子了，有时跑到厕所偷偷哭一会儿。”

抗战胜利，党组织派父亲北上做地下工作。他冒着风险，硬是用一张飞机票拉扯着我们俩一起上了飞机，离开重庆。后来，我们被寄养到无锡乡下老家，亲戚拿父亲留下的育儿费放了高利贷。我们吃得很差，满身虱子。

安顿好中国纺织公司青岛分公司的公开工作之后，父亲匆匆赶来接我们，不胜唏嘘。所幸的是，我们终于又和父亲团聚，住在青岛市嫩江路的公司宿舍里。

1947年9月的一天，父亲告诉我们：“妈妈回来了！”姐姐和我站在楼梯上，兴奋地等待。一阵喧哗过后，听到父亲“来，来，两个孩子在这里”的声音时，我却一扭头跑回家躲了起来，久久不肯出来相见。其实，我心里早已乐开了花，“别人的妈妈都在家，我们的妈妈也终于回家了！”

母亲带回来几个大铁皮箱子，我们好奇地围着它们转来转去。原来，里面主要是书，厚厚的，硬皮的，都是我不认得的字，这些都是母亲省吃俭用买回来的。

母亲要开始她终身孜孜以求的美国史研究了。

那时，我们常常发烧。为了哄我们忘记病痛，母亲常常讲故事。在清华时，她曾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干将，人称“小钢炮”，口才特别好。我至今记得母亲是如何讲小红帽，灰姑娘，海的女儿，还有岳母刺字，“精忠报国”，以及模仿张飞在长坂坡前“哇呀呀呀”的那一声怒吼。母

## □ 荷花池

亲故事讲得棒，但她又太忙了，难得空闲。所以，有时我会谎报军情：“妈妈，我发烧了！”希望把忙于工作的母亲吸引过来。

父母的卧室里有一个小壁橱，顶上有一个小阁楼。一次趁他们不在家，我和姐姐偷偷地爬了上去，只见上面有一个像砖头一样的草绿色的收音机，还有一些绕来绕去的细线，旁边还有纸、笔。我们有点害怕，什么也没敢动，就悄悄地下来了。

父母得知此事，神情凝重。父亲把手重重地按在我们的肩上：“你们绝不可以向任何人讲，你看见了什么。如果讲了出去，你们以后就会永远见不到爸爸妈妈了。”虽然我从小胆大淘气，但听到这么严厉的警告，大气都不敢多出，只是不停地点头。

1949年，解放战争节节胜利，国民党溃不成军，驻扎在青岛的美国军队也准备撤离。大批从东北、华北等战场溃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汇集于此，此时的青岛已成为去往台湾的重要运转站，而这里的地下工作变得更加复杂，异常艰巨。

父母在解放区山东工委的直接领导下，进行了反对南迁和护厂、护校的坚决斗争，并取得了巨大胜利。5月底，在一位工程师的家中，聚了好几家人，听着远处传来的阵阵枪炮声，大家议论纷纷。有人说：“共产党就要来了，听说他们都是红鼻子绿眼睛，还要共产共妻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”父亲镇定地说：“这么多的人都留在了青岛，大家一定会活下去的。”

6月1日，整夜枪炮声不断。父母已经几天不在家了，我和姐姐偷偷爬到中纺五厂的最高楼楼顶，亲眼看见远处两边交火的情景。

6月2日，青岛宣告解放。到处是红旗，到处是歌声。

那几位曾经议论过共产党的熟人，看见我的父母亲穿上了灰色的列宁装，出入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，不由得一惊：“哎呀，原来你们就是共产党啊！惭愧，惭愧！”

后来，父母回忆，青岛解放前夕，他们地下党员是如何与群众一起冒着生命危险，积极进行护厂、护校等斗争，写英文传单向美军做宣传，收集敌特潜伏情报，向港澳台派遣地下工作者（仅被父亲一人派遣的就达三百多人），紧急转移已暴露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……

青岛解放后，在敌特档案中得知，父母都已上了黑名单，如果青岛再晚解放一周，他们一定会被秘密逮捕。

庆幸的是，青岛终于在6月2日解放了！解放真好！

## 二

新中国成立后，母亲被中共青岛市委分配到山东大学文史系任教授，讲授美国史和世界史，同时还担任几种社会职务。那时的她，短发，有时浅蓝色的竹布大褂，有时灰色的制服，脚上则是一双布鞋。如果不是鼻上架着的一副金丝边眼镜，很少人能把她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区分开。

母亲生活朴素，从不吸烟，虽有酒量，但除了偶尔小酌外，从不豪饮。她平易近人，很快就与师生们打成了一片。

在青岛的几年，母亲几乎全部身心都扑在了美国史的研究和写作上。每晚醒来，我们姐妹都能看到从父母卧室门缝里流淌出来的灯光。后来，母亲又怀了孕，妊娠



2004年1月7日，黄绍湘（左）与清华学友吴翰重聚

反应特别厉害，经常呕吐，但她仍然伏在书桌，将书立在面前，继续工作。

1950年6月，朝鲜战争爆发，国内对美国史的研究有了强烈的现实需求。母亲的专著《美国简明史》随即应运而生。那年的初秋，弟弟汝谐——一个健硕的胖小子出生了。

虽然母亲深知母乳对幼儿发育的重要性，但是为了修改第一本精心撰写的专著，她只能忍心割舍，给刚刚出生的弟弟请了奶妈。弟弟10个月大时，为了修改《美国简明史》初稿，母亲又一次毅然决定，独自调到北京，在中央人民出版社任编审。

母亲首先要完成出版社的审稿工作，然后才能修改《美国简明史》，她主动提出，编审之外修改书稿时间一律记录在案，扣发工资。

当时，母亲没有助手，更没有学生，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，甚至连写家信的时间都没有。我想，母亲自从与美国史结缘，就把全部心血凝聚于此，那就是她亲自孕育、生产的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啊。

一年后，我和姐姐先一步到北京来上学，父亲因为工作需要，带着弟弟在青岛

又过了一年。这期间，家里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了：弟弟不幸感染脑膜炎，病情危急。接到加急电报，母亲急忙定了赶回青岛的火车票。临行前，她在窗下匆忙地缝着一条要穿长裤的扣子，双手颤抖。她说：“怎么办呀，去晚了可能就看不见他了。”但是母亲没有落泪，方寸不乱。她安排好了我和姐姐的生活，奔赴青岛。

幸好，医生为弟弟抽了脊髓，动了手术，再加上母亲的精心呵护，他的命最终保住且恢复得很好，没留下后遗症。同期患病的一百多个孩子中，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之一。

1953年，《美国简明史》出版。出版社支付了数千元稿费，母亲全部交了党费。专著一出版，母亲就更忙了，她不但要撰写第二本书《美国早期发展史》，还要不断地参加各种活动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很可能因为不是工农家庭出身，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，所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，历次政治运动，母亲都被视为“右倾”“白专”，不断进行思想检查。她无法埋头专心做学问，反而要用珍贵的时间去进行“脱胎换骨”。她参加过广西的土改，调查过肃反对象的历史问题，做过多种宣传员、文化教员，还被下放到周口店农村劳动。

那时的母亲，只有当夜幕降临，才能沉浸在心爱的美国史研究中去。无论什么地方，无论什么任务，她都会随身携带一些书籍和资料，有一次甚至还带上了法文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哪怕只有几分钟，哪怕只有一两片纸，只要有空，她就会看上一眼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政治气氛还算平

## □ 荷花池

稳，我们家也比较欢快。父亲带弟弟来京的那个新年，我们还开了一个家庭晚会。父亲吹笛子，表演杂技：他能把鸡毛掸子立在额头上，来回走动而保持掸子不掉。母亲大声地唱“同学们大家起来，肩负起天下的兴亡”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。姐姐打起腰鼓，家中一片欢腾。

那时，父亲在马列学院（现在的中央党校）进修，只有周末才能赶回家。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，就是星期日去公园。

1956年初，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。母亲鼓励我和姐姐动手做些科学实验，看见我们没有行动，她竟然自己身体力行，做出了一个矿石收音机，还剪了一支彩色的纸蝴蝶贴在上面，取名为“蝴蝶牌”。当我和姐姐听到“蝴蝶”里传出的美妙广播，既惊喜又惭愧。

1957年“反右”之后，家庭和社会气氛日渐凝重。父母看见一些大学生被划成“右派”，警告我说：“你幸亏晚生了两年，不然也很危险！”他们带我去看了很多大字报，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。那时，母亲的第二本专著《美国早期发展史》出版，她成为党内卓有建树的专家，但是也不断受到“白专”“成名成家”思想的质疑和批判。

1958年，母亲被下放到周口店劳动。暑假我坐长途汽车去探望她，那里的生活艰苦，吃的是掺了糠的麸子面窝头，住的是草房泥铺，蚊子跳蚤让人难以安睡。

母亲白天要参加劳动，赶着小毛驴，在菜园子里除草、浇水。看到此情此景，我不禁流下了眼泪。但她却说：“一个共产党员，就应该与老百姓同甘共苦。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，我来这里短期锻

炼，这算什么苦呢？”

母亲的小屋很简陋，唯一的一张小炕桌上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书本笔记，一盏煤油灯擦得锃亮。母亲每夜都要伏案阅读，我在夜里醒来，催她快睡，她总是头也不抬，对我说：“我习惯了，你再睡吧。”

在周口店住的那几天，我永远难忘。

1960年，母亲被调到北京大学，开设美国史讲座，她依然超负荷地工作着。过度的劳累招来了病魔的侵袭。1964年，母亲罹患肠息肉症，几次被误诊，她不能进食，奄奄一息。

幸而，在父亲的百般努力下，最终在中苏友谊医院确诊，并动了6个多小时的大手术，切除了80厘米的大肠。病后，母亲用超人的毅力加强康复。有一次，姐姐去探望她，看见她正扶着墙，慢慢行走，摇摇晃晃，步步艰难，姐姐非常感动。

### 三

“文革”的群众运动，狂风暴雨般席卷全国，我们所住的中宣部大院，首当其冲。大字报铺天盖地，风中舞动，观者如潮。万幸的是，父母都很坚强，家族里、好友中也没有一人自杀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，而是因为他们有真正的信仰，有真正的亲情。

当年青岛地下党负责人之一、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曾亲口对我说：“20年以后，历史会还原真相。”舅舅黄宏嘉（中科院资深院士）“文革”前已是国际知名的微波与光纤专家，“文革”中因为“美国特务嫌疑”，又是反动学术权威，被关押在地下室。他在大衣的折缝中密密地缝入了100多粒的安眠药，以求速死。但是，

为了不连累家人,舅舅终于咬牙挺了过来。他没办法做科学研究,就在体力劳动之余,研制成功了如何用废铁罐打造出经济实用的煤油炉子。

北大的“造反派”来抄家两次,第一次来势汹汹,想要把手术后仍然体弱的母亲捉到北大去批斗。他们进了中宣部大院找不到我家,问路时恰恰问到了弟弟头上。弟弟机灵地指向了相反的方向,然后绕道跑回家告急。姐姐护着母亲急速离开大院,去了东单,天黑后又去好友家藏了几天。

“造反派”捉不到人,抄走了十几麻袋的书信、照片和书籍,后来又补抄了一次,许多有历史意义的文物损失殆尽。特别是母亲正在写的新书的手稿和札记,被悉数抄走,那真是她用生命为代价积累起来的啊!

母亲的心在滴血。但是,她不认输:“皇天不负有心人。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。我还可以从头开始。”母亲咬紧牙关,一点一点重新积累资料,写在随手能够找到的大大小小的纸片上,有时还要用当年做地下工作时候的办法,把纸片藏在不会被发现的地方。

1969年冬,寒风凛冽,几辆三轮车载着父母被抄家后的全部家当,我们搬到了新的栖身之地——北大东门外燕东园29号楼下待修理的两间住房,总算又有了一个窝。

房间很少,刚去时,母亲就将床板搭在过道上。没有暖气,生蜂窝煤炉子的技术又不熟练,有一夜,母亲和我都中了煤气,抬出屋子后,在院子里躺了好几个小时才苏醒过来。父亲在干校,被怀疑为“五·一六”分子,专案审查,吃尽苦头,

险些送命,幸而由姐姐奔走营救,死里逃生。

母亲又被要求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,住在历史系学生宿舍的六楼。她腿脚不好,无力上下楼去食堂吃饭,常常以干粮充饥。有好心的女学生,有时会帮她打来开水。那时,宏嘉舅舅送给她一个自制的小煤油炉,帮了母亲的大忙,她可以用来煮一点挂面吃。

有时,为了让母亲回家吃点东西休息一下,我会在夜里骑一辆低矮的女自行车,偷偷地带着她离开宿舍。她坐在后座上,我们从北大未名湖旁的陡坡上急速下行,母亲的手总是紧紧地抱着我的腰。现在想起来,真是后怕。

“文革”十年,最让父母刻骨铭心的,是对他们革命生涯的歪曲和否定,扣上“假党员”“美特嫌”“反动权威”这些莫须有的“帽子”。有一次,专案组反复逼迫父母承认是假党员,遭到他们拒绝。专案组悻悻离去,居然忘记带走他们外调时其他同志证明父母是“真党员”的证明材料。

尽管如此,我没见过父母亲流过一滴眼泪,发过一句哀叹。他们总是要我们坐下来,商量家里的难题,共同想办法应对。家庭的亲情像一张坚实的大网,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牢牢地兜住。

1976年盛夏,父亲在燕东园的东屋对我说:“现在党内有一个铁盖子。总有一天这个铁盖子会被打碎的!”父亲又振臂高呼:“打倒江青!打倒江青!”我听了大吃一惊,连忙走出房间,看看有没有邻居在附近,又出了小院门,绕着小楼转了一圈,确信没有任何人听见,才松了一

## □ 荷花池

口气。

父亲一向稳重，谨言慎行。这一次，他实在是憋不住了。

### 四

“文革”终于结束，改革开放给我家带来了天大变化。父母调到了世界历史所工作，母亲的美国史研究工作，开始了新的里程。由于在“文革”不离不弃、日积月累，1979年，母亲出版了《美国通史简编》。后来，1987年出版了《美国史纲》，共100多万字，超过了“文革”前出版的两本专著的76万字。

过去的几十年中，父亲一直是“贤外助”。正式调动到一起工作后，他对母亲的帮助更是关键。特别是面对美国史研究中否认马克思主义，把美国的政治、经济制度捧上天的那股潮流中，父母并肩奋斗，就像回到了年轻岁月。

2001年，《黄绍湘集》出版，它是父母共同劳动的结晶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和弟弟先后去美国求学。一晃十余年，父母步入了真正的老年。但是，他们以美国史为生命重心的理念，从未改变。80年代中期，母亲作为美国国务院邀请的知名学者，赴美讲学访问，作学术交流。后来又与父亲一起，在90年代两次赴美探亲，在纽约和旧金山轮流居住。

为了不忍长期分离，我提出了为父母申请美国绿卡的建议。他们婉拒，“我们的事业在中国。我们的根在中国。”

为了使研究工作不中断，父母两次来探亲前，都先让我托运他们整箱的书籍资料。来了之后，除了必要的休息锻炼外，

他们两位还是以工作为主，并开出长长的书单，要我在任教的大学图书馆借阅。母亲的好几篇文章，都是在探亲期间构思和完成的。

父母要我借的书，有的非常专业，我们的图书馆没有，还要从其他专业图书馆调转。一位与我熟识的馆员好奇地问：“你在研究美国史？还真不知道金融教授会有这个业余爱好。”

父母两次来美国探亲，只拿出过一周时间和我们去旅游。1992年春假，我们一起驱车去了加州南部的迪士尼乐园和圣地亚哥动物园，途经了拉斯维加斯、大峡谷和胡佛水库。父母高兴得像个孩子，不断地要求“再排队！”“再重来！”“再去看！”他们的天性是如此质朴纯真。

记得母亲在旧金山时，看到我身在商学院任教授，心中却念念不忘儿时的文学梦，便脱口而出一句英文评论：“Yours is profession, mine is career.( 你的是职业，我的是事业 )”我听了心服口服。

父母终于还是返回了北京的家，那是“文革”后搬去的社科院宿舍，在紫竹院公园附近。为了保持健康，他们养成了几



黄绍湘与丈夫毕中杰双双获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奖章



2013年5月，黄绍湘在家中阅读报纸

乎每天去公园的习惯。

母亲喜欢打太极拳。六十多岁时，一位老战友告诉她，“打太极拳有益健康，但是你现在学太晚了”，母亲回答：“对我来说没有太晚的事情。”从那时起，她坚持打拳数十年。

每当在公园练拳，都会有人驻足观看，打听老太太的年纪，母亲的回答年年一样。

“80多啦。”父亲则是微笑不语。大家称他们两位是“紫竹院的健康老人”。

2007年11月，父亲因病辞世。同年10月，母亲也不慎摔断了右大腿骨。92岁高龄，连遭两难，对母亲的生命是严峻的挑战。

那年岁末，清华校友、原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及夫人宋汀，派专人送来慰问手书。母亲在病榻上回复道：“住院协和奈何天，勇战病魔日维艰。喜读老友赐鸿书，冬日春风沐心田。少年同志清华园，风雨如磐七十年。伏枥老骥勤奋蹄，烛泪蚕丝心愈丹。”

七年来，母亲与疾病顽强拼搏，历经艰苦。她战斗意志不改，不能站在地上打太极拳，就坐在轮椅上打；不能自己独立行走，就用步行器往前推移。无法像以前

那样长时间地工作，但是只要精力许可，她一定会拿起书籍报刊。

母亲订阅了好几种报纸，每天注意国内外时事。她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，她给社会科学院学报写文章缅怀生命历程，为纪念建党90周年写诗，为已故的老战友蒋金涛、罗青写回忆录，邀请昔日清华校友家里相聚……

母亲生性豁达，随着年事渐高，更对生死看得很开。父亲健在时，他们就一起笑谈身后之事，对尚未完成的文稿，对珍藏的书籍，等等，事无巨细，都有安排。

近年来，母亲更是对我们说：“生死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你们到时候不要过分悲伤。想起那些为了革命牺牲的战友，作为幸存者，很庆幸我还拥有了这么多年的时光，做了我想做的事情。”她曾说过：“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，并不相信生命轮回。但是，如果真的有来世，真的让我再次选择，我还是会走同样的道路。”

谁能说，只有幼儿的微笑、脚步才是轻盈美丽，带来希望？母亲，她那近百年生命发出的智慧之光，也是我们心里最珍贵的宝藏。母亲在清华大学原来是学外国文学的，是抗日救国的愿望驱使她改学了历史。近来，母亲要我找出她年轻时最喜爱的诗作之一，雪莱的《云雀》，反复吟诵。

在我们的心里，母亲就像是一只云雀：“你从大地一跃而起，往上飞翔又飞翔，有如一团火云，在蓝天平展着你的翅膀，你不歇地边唱边飞，边飞边唱。”

祝愿母亲平安、康健！百岁华诞快乐！

（原载《光明日报》2014年6月6日）